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

陈 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市 100082)

摘 要:口述历史是一种言语活动,即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采访人须具备交际语言能力和语言学知识,懂得营造和适应语境,熟悉地域和社会方言,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在采访对话中能觉察口误、概念不当等言语事故,设法质询、订正或标记、说明。在口述历史录音抄本的整理过程中,保留口语形态,致力于保持语、文张力。口述历史可作语言学研究路径,可使用访谈和实验方法调查语言现象、研究语言问题;在录音抄本整理中进行语音识别、语义分析、言文差异、言语理解、言语表达等方面研究;录音录像档案即语料资源,可供方言、语言历时演变、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等进行研究。口述历史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亦即大型语言数据库,可供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推进语言学研究方法革新。还可通过口述历史进行“语言人”的研究,通过口述历史,研究言语风格、个人方言、口头禅等因素,探索言说者的思维习惯、心理信息和精神特质。为濒危语言使用者做口述历史,可记录口述者生活阅历和文化经验,同时记录濒危语言的“语言病历”,鼓舞该语言使用者的信心,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态;进而建立“语言种子库”,为语言复兴保留一脉生机。

关键词:口述历史;语言学;言语活动;言语事故;语文张力;人类个体记忆库;语言人

中图分类号:H030;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4-0125-20

口述历史与语言及语言学的关系,可谓不证自明:口述历史的来源和形式,是个人的“口述”。它是一种言语活动,由采访人与受访人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语言能够建构任何语句,并非满足再现真相的欲望,而是满足特定场合下特定讲话者的表达的需要”,即“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它所谈论的世界”^{[1]144-145}。进而,“我们也知道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2]15}。进而,口述历史编纂抄本还需录音整理者和编纂者的参与,“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将口语语法(spoken syntax)转换成书面语法(written syntax)有时可能是相当主观的,不同的人会以稍有不同的形式聆听和转录访谈录音,这毫无疑问会导致产生不同的意义”^[3]。针对上述种种情况,“历史学家只有解决了有关史料的语言问题之后才能进行史料的内考证,即考证史料的陈述是否可信”^[4]。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的关系,可从两方面提问:一是口述历史需要从语言学那里学习什么?二是口述历史能够为语言学研究回馈什么?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未见前人相关研究文献,文中引述的语言学家张宜教授的《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也只是对语言学家进行采访,请他们谈论语言学研究的经历及观点,而不涉及采访中的语言及语言学问题,更没有对“口述历史与语言学”问题进行学理层面的思考和讨论。可见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个别口述历史家的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也较零碎且随意。本文将进行以下讨论:一,口述历史采访人如何引导创造一场成功的会话合作?二,采访人如何面对口误、概念使用和理解错误、词在唇边说不出等言语事故?三,口述历史家如何制作出真实而准确的文字抄本?四,人类个体记忆库即口语的语料库,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及其言语资料,可否作为研究语言变异的一种新路径?五,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可否作为研究语言

收稿日期:2015-03-06

作者简介:陈墨,原名陈必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研究”(12AC003),项目负责人:陈必强。

人的一种路径?六,口述历史能为濒危语言做些什么?是否可以用来诊疗语言的危机?

一、口述历史与会话合作

在一次口述历史研讨会上,主持人要我谈谈自己的“采访经验”,如何做才能保证采访的成功?我不知从何说起。我虽做过很多口述历史采访,有经验也有教训,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却还是不知该怎么说。因为口述历史采访,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合作,受访人的社会身份、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不同,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理解能力和交际能力不同,乃至采访的机遇和具体环境不同,采访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无非两条:一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二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这说法未免太“那个”了,或许有人听明白了,恐怕也有人以为我在糊弄。

如何做好口述历史采访?与传播和传播学有关,也与语言和语言学有关。传播学话题已经说过,这里专门讨论口述历史与语言和语言学。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口述历史采访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语言敏感和相应的交际能力,学习语言学——包括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为什么要在语言能力之外,还要学语言学?假如让一个只会说北方方言或普通话的人,去采访一个只会说广东或福建方言而不会说普通话的人,结果是采访无法进行。普通的新闻采访或简单的社会调查,或许还可以请一个翻译,将方言或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普通话。但要带着翻译做口述历史采访,恐怕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能勉强做到也必定事倍功半。

口述历史工作者要学语言学,是因为除了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外还有“社会方言”一说:当人们把语言或方言中的某些特色看成说话人的一个社会标记时,这一方言或方音就染上了社会色彩而被称为社会方言^{[5]74};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用词,木匠、裁缝、牧民、渔民、学生、军人都有好些词是在本行业范围使用,别人不大了解;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同一专业的人在一起谈业务问题,外人听来往莫名其妙,所谓“隔行如隔山”^{[6]121}。社会方言可以分为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隐语四类^[7]。《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懂得土匪黑话,懂得“天皇盖地虎”要以“宝塔镇河妖”相对,否则只怕即刻丢了性命。让一个对音素、音位、转换生成语法等毫无认识的人去做语言学家的口述历史采访,结果如何?虽无性命之忧,但无法完成任务。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话题:采访人如何称呼对方?过去我们对所有人称“同志”,后来又称“师傅”,最新的时尚是称“老师”,假如称呼一个人“老师”而对方回答说:“我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不是老师!”或:“我是做生意的,不是老师!”你怎么办?假如你学西方时髦,称男士为先生,称女士为小姐,前者可能问题不大,后者在一些地方说不定会换来一记耳光。假如你到台湾去,接受内地的教训,不称女士(包括年纪较大的女士)为小姐,又会出现新的情况,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礼貌,想要做她的口述历史?门儿都没有。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说要做口述历史,我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一个50多岁的城里女士该如何称呼?对一个同样年龄的农村女士又该如何称呼?他说称“大娘”。这是聪明的回答,但结果却不见得好:他会在50多岁的城市女性面前遭遇白眼——她更喜欢人们称她为阿姨,而不是什么土气又老气的“大娘”;在同年龄的农村女士面前,说不定也要遭遇白眼——她的孙子也近20岁了,怎么还叫我大娘而不称呼“奶奶”?在城里,如果称呼一个20来岁的女士为“大姐”她会不高兴,称呼她为“美女”才能换来笑颜和应答;若在农村地区称呼一个年轻女士为“美女”,说不定她和她家人都要把你看成不怀好意。称呼语在不同的职业、社会身份、年龄和性别人群中有许多变化,在不同场合即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也还有不同变化。如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称呼语使用上的变化,与其他语项的变化一样隐含着潜在规则^{[5]41}。

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无非是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成功对话。社会语言学家对会话即交际活动有不少专门研究,口述历史工作者最好能了解其中的关窍^①。格赖斯提出会话中双方都应遵守

^① 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了一个描写交际事件的框架,他认为一次完整的交际事件包含16个基本特征,分列在8个大标题下。这8个方面可以用英文标题的首字母SPEAKING来概括,即:S(场所和场景),P(参与者),E(目的),A(行为序列),K(基调),I(媒介),N(交往规范和解释规范),G(交际类型)。见祝晓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166页(版本信息见参考文献,脚注文献下同此例)。

“合作原则”，包含四个准则：数量准则，即所提供的信息满足并且不多于会话的要求；质量准则，即不说自己相信是错误的事情，不谈缺乏足够证据的事情；关联准则，即所说的话必须是相关的；方式准则，即说话应简洁，有条理，避免模糊、歧义^{[5]41}。这每一条都值得口述历史采访人认真揣摩，并在实际采访中实践和发挥。口述历史的目的是要采访、倾听并记录受访人口述生平，采访人遵守合作原则并主导对话合作显得至关重要。有时候，采访人稍不留意就做出了违犯合作原则的事。我本人就有这方面的教训。一是在写作《采访提纲》时，为了将话题集中并节省篇幅，将同一话题之下的分支话题都放在一起，例如问及电影摄制组的构成时我写的是：“组建摄制组由谁说了算？导演、制片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三者谁的权力最大？他们如何分工合作？党支部书记都是专职的吗？党支部书记是否参加创作讨论？在拍摄时是否干预导演的工作？每天都要开党支部会吗？如果导演和党支部书记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这些问题或许都值得提问。问题是将这些写在一起，有时会让受访人无所适从^①。进而在早期采访时，我常常忍不住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后来发现我这么做副作用很大^②。无论是话题过于密集还是采访人的话太多，都明显违背了对话合作的数量准则，实际上同时也违背了方式准则。上述四条准则中的方式准则，简洁明了固然重要，对采访人而言，提问得体 and 巧妙同样重要。同样一个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结果很可能如俗语所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

利奇等人对格赖斯的观点有所补充和发挥，认为人们的言语行为受“人际修辞”和“语篇修辞”支配，各由一套准则构成。在“人际修辞”中，利奇提出“礼貌原则”，具体包括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六个准则^③。其中言语得体最为重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空间(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这便是言语得体”^{[8]183}，倘若“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8]223}。我相信每个采访人都相信并愿意遵守言语得体准则，多数采访人也都会努力做到言语得体。问题是，其中有时间、场合、对象三个变数，想要完全避免语用失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就有过多次语用失误。例如在采访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原经理胡健先生时，一句不恰当的追问，让胡健先生非常生气，拂袖而去。另一次是采访中国电影出版社原总编辑富澜先生时，一句不恰当的幽默，让富澜先生相当不快，警告说“不要跟我乱开玩笑！”^④还有一次更严重，那是精心设计的实验性重复采访^⑤，采访对象是我熟悉的一位著名教授，事先我已向第一采访人及受访人说明了实验采访的目的和方法并征得同意，我将精心准备的几十页采访提纲打印出来送交受访人，商定了正式

① 无所适从是指：一方面，不少受访人都喜欢在《采访提纲》的行间写出答案提要——不管提纲打印稿的行距有多宽，都无法写下这么多问题的答案提要；另一方面，将这么多问题放在一起，受访人往往难以抓住重点。对策之一，是将这些问题加以适当的分行；对策之二，是将问题集中成一个，如“这个摄制组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如何？”在正式采访时再将这个问题分解，逐个提问。

② 副作用包括：其一，采访人说得太多，让受访人的口述主体的地位受到侵犯；其二，打乱了受访人的口述计划及其讲述节奏，使得后面的口述难以顺畅地进行下去；其三，采访人说得太多，有时还会影响受访人的情绪，尤其是采访人与受访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看法不一致时。

③ 利奇的“人际修辞”六条准则的具体内容是：(1)得体准则：最小限度使别人受损，最大限度使别人受益。(2)慷慨准则：最小限度使自己得益，最大限度使自己受损。(3)赞誉原则：最小限度地贬低别人，最大限度地赞誉别人。(4)谦虚准则：最小限度地赞誉自己，最大限度地贬低自己。(5)一致准则：使交际双方的分歧减到最小，使交际双方的一致增到最大。(6)同情准则：使对话双方的反感减到最小限度，使对话双方的同感增到最大限度。见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第254-2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④ 采访胡健和富澜的录音及录像档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尚未向公众开放。《胡健访谈录》(边静主编)和《富澜访谈录》(蒙丽静主编)作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中的两部，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那一次胡健先生拂袖而去，半小时后他就平静下来，继续接受我的采访。富澜老师不喜欢乱开玩笑，是因为他经历了22年右派生涯，性格坚强固执但内心却脆弱敏感。这两位前辈分别于2009、2014年先后辞世，回想起当年采访二位前辈的情形，心中充满感激和怀念。

⑤ “实验性重复采访”指：由两个采访人对同一个受访人进行重复采访，实验目的是希望了解不同的采访人采取不同的采访策略、不同的提问方式，会有怎样的采访结果。实验方法是一个采访人按照自己的方法采访结束后，另一个采访人进行重复采访。重复采访会提出一部分新问题，也会就前一个采访人提出的一些问题换一种方式进行重复提问。重复采访计划，要事先征得受访人和第一采访人的同意，且第二采访人还要与第一采访人就实验目的、实验方式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

采访时间,没想到在正式采访前,受访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取消采访!此事让我猝不及防,完全不知何故,仔细反思与受访人交际的经历才想起我有一次“语用失误”,或许让老人家不快^①。

塞克斯、齐格洛夫、杰费森等民族方法论者提出“话轮交替”(turn-taking)概念,是在对话中说话人和听话人进行角色互换的现象。支持话轮交替的机制是一套依次选用的规则,它是仅对会话发挥作用的一种局部支配系统。受支配的最小单位就是话轮(a turn),表现为角色互换的过程中说话人每一次说出的话语。两个形式和内容紧密联系着的话轮构成“相邻对”(adjacency pairs,包括刺激话语和反应话语,即问和答,又称对话统一体),相邻对进一步划分为第一配对部(the first pair-part)和第二配对部(the second pair-part)。两个配对部之间进行切换的位置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角色互换的位置,叫做“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RP)^{[9]227}。换言之,对话是言语交谈的交换体系,它有规则保证交谈依次顺利进行。根据对话分析的结果,对话时存在轮流规则、打断规则、引进话题规则和沉默规则^[10]。口述历史采访人要熟练掌握这些规则。口述历史采访与一般性日常会话不一样的地方,是采访人要少说多听,不能简单按照“你一言、我一语”的日常对话规则进行话轮转换,而是在提出一个问题之后,要等到受访人将这个话题说完才能进行话轮交替。有时候,受访人说得兴起,从一件事联系到另一件,不按话轮交替规则说话,维持“相邻对”的齐整常常只是一种理想。一般情况下,采访人不宜随意打断对方。特殊情况下,诸如受访人信马由缰、离题太远时,尤其是受访人口述时经常出现离题的情形;当受访人出现明显的记忆错误、知识错误或口误,需要及时订正,或受访人所说出现明显歧义以及采访人对其使用的概念有疑问时,采访人必须及时打断对方,或提出新的问题,或对其中错误进行及时订正,或对其中歧义或模糊性提出具体的咨询。此时打断对方的理由是,若不及时打断、及时订正或求证,采访人自己也会忘记,从而导致整理抄本时跟着出错。还有一种情况,是进行集体采访,采访人要一对多,需要根据现场人数及受访人的踊跃程度等多种因素“分配”话轮:让甲说,暂时不让乙或丙说。此时,采访人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在场者的具体情形,以便恰当地分配话轮,稍有不周就会出错。下面是我出错的例子:

袁:当时把这个张学华法办了,法办了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一年半?……我当时不在,后来我听说是张学华发电机着火了。

……

袁:我是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没到队上去。

姜:那时候张学华——

陈墨:姜老师不在,那时候不在,已经离开了,是吧?

袁:那时候就是我,我跟张学华两个人在队上……^[11]

在这段对话中,我的错误是不恰当地打断了姜的话。尽管有打断的理由^②,但实际结果却不好,一是此次打断挫伤了姜老师的情绪,此后她就很少说了;二是袁老师当时也不在事故现场,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事后反省,假如当时我没有打断姜老师,让她说,她至少能说出对张学华的认识和对此次事件的看法,说不定还能引发袁老师对此人和此事的更多回忆。无论如何,我该认错。

引进话题的规则看起来相对简单,只有当受访人对一个话题陈述结束时,采访人方才可以引进

① 我的语用失误,是我在到受访人家里去商谈正式采访日期之际的闲聊中,受访人说起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对他的影响,充满钦佩之情;谈及“胡风反党集团案”,愤懑溢于言表。我虽然也钦佩并且同情胡风,但对他的诗作《时间开始了》有点不以为然,就说了胡风的糊涂和天真,这很可能引起了受访人的不快——我说“很可能”,是因为受访人无论如何都不说他拒绝采访的真实原因,我只能猜测。我对这位前辈一向尊重且敬佩,应该没有别的得罪之处,唯一的语用失误只能是这个。此次实验性采访未能如愿进行,是我做口述历史经历中最大的遗憾之一,此后因为时间关系和其他因素,此类实验性采访就再也没有启动过。

② 这是一次小型的集体采访,受访人只有3位,分别是陕西省第一支女子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卢、第二任队长袁、队员姜。这一小段话题是放映队出了一个事故,放映员张学华一个人既发电又放电影,不小心酿成火灾,被判刑。此时卢和姜都已调离女子放映队,袁任队长。在采访现场,我打断姜,将话轮分配给袁,理由之一是姜那时候已经离开长安女子放映队;理由之二是我发现袁当时说话极少,不问就不说话,我希望袁多说;还有一条理由是此前我已经采访过姜,较熟悉了,所以就不礼貌地打断了姜。

新的话题。如上所说,若受访人无节制地“信天游”,采访人应及时引进新话题,即同时执行打断规则和引进新话题规则。还有一种情况,是采访人在受访人陈述时发现了新的线索,产生新问题,该怎么办?假如这个新线索或新问题与原有话题密切相关,那就需要采访人见缝插针,找机会提出新话题。若非关系密切,通常情况下,需要等受访人的陈述告一段落再提出新问题。有些受访人相对严谨,习惯于三思而后言,即对所有话题都要进行思考和编辑,那就要在中间休息或当次采访结束时专门与受访人协商什么时候引进新话题。

最后,沉默规则最微妙,因而最难办。语言学家说,在现实交际中,沉默无声的现象可以被赋予各种含义:默认、羞涩、沉思、不满、放弃、威严、挑衅、拒绝、暧昧,等等^{[9]237}。这需要采访人具有“阅读沉默”的能力——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遭遇沉默——多数人都能从沉默者的表情中读出大体的内容。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还有另外几种沉默:一是思考短路,需要采访人及时提示;二是话题说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此时需要采访人帮助,或者提供思考线索,或者提出新问题;三是如果采访对象是老人,那就还要考虑最后一种因素,或许老人累了,不想说了。采访人不仅要有阅读沉默的能力和应对沉默的技巧,还可以运用沉默作为“问题标记”方式,例如在受访人讲述了不真实信息时,再三质询也无济于事,采访人此时应短暂沉默,作为标记^[12]。

二、口述历史与言语事故

口述历史采访现场就是言语交际的现场,即言语产生/生产、词语提取、句子组织及语音辨析、话语理解的现场。在任何一个真实的言语活动现场,都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言语事故”,包括编码失误和解码失误。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言语事故的类型有多种,经常遇到的包括:(1)口误现象;(2)概念理解和使用时出错现象;(3)话在嘴边/词在唇边现象。

先说口误现象。在言语活动中,口误是最常见的言语事故,口述历史采访会话也一样。心理语言学将口误称为言语错误。在日常言语活动中,说话人将“张三”说成“李四”,将“春天”说成“秋天”,将“1937年”说成“1973年”,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口述历史采访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如:“我父亲这个人,他在国民党时候干的究竟咋样,也不清楚。后来解放,让他当参议长他不去,就在家赋闲。”^[13]这句话中把“光复”(1945年)错说成“解放”(1949年)。此处口误在采访现场难以辨别,上下文本身含糊,按照下文“让他当参议长”,应是指光复后解放前(解放后的政治体制中没有参议长这一职位);问题是上文却又有“他在国民党时候干的究竟咋样”一说,暗示后文指的不是“国民党时候”,即解放后。又如:“一位受访者在访谈时回忆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楚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在后来的确认稿中将《楚辞》更正为《离骚》;另外一位受访者回忆,1939年在日本占领区北平没有受到日本影响的大学‘有美国办的燕京大学和日本人办的辅仁大学’;在确认稿中,将‘日本人’改为‘德国人’。”我注意到,正式发表的访谈录文本按照口述人的更正说明进行了修订,并没有留下口误的现场痕迹。口述历史的采访现场或多或少会存在口误现象,但绝大部分口述历史著作中都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痕迹。原因很简单,人们把口述历史现场的口误当作“错误”删除了。编纂时进行某些删除、更正,不难理解,只不过它也遮蔽了口述历史言语活动的现场情况。

口误现象并非受访人/口述人的“专利”。采访人的话相对较少,出错率相对较低,但也有口误现象。我自己就出现过:“《卖花姑娘》是1974年的。”^{[13]150}——正确答案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于1972年8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当年在全国发行放映。幸亏受访人说“哦,这个记不清了”,没有引起一连串的错误。受访人/口述人的口误,仅仅是出现单纯的错误信息,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引起连串的信息紊乱或错误;而采访人出现口误,引起连串信息错误和信息紊乱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采访人是提问者 and 主导会话的人。

言语错误即口误现象,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各有一套解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相当肯定地说:“我发现大量语言表达的混乱和那些被冠之于‘语误’的微小差错都不是‘音节联系作用’的影响,而是潜藏在表层交谈下决定语误出现的思维的影响而造成的”^{[14]79},即“每一个错误的背后,都

有被潜抑着的心理内容。更明确地说,每个‘错误’都隐藏着一份‘不真实性’,一份来自潜抑思想的扭曲”^{[14]210}。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口误及其他言语错误的例子进行分析,证明他的上述猜想。不只是弗洛伊德这样想,弗洛姆也说:一个即便主观上真诚的人,也经常受到潜意识动机的驱使,它与个人确信的主观动机不同,他可能会使用一个逻辑含义确然的概念,然而在潜意识里,该概念又另有所指,异于这个“官方的正式”含义^{[15]48}。

对于口误现象,语言学家也有其专业解释。Fromkin 等人认为言语错误是有规律性的,它表示了语言系统的基本表征和组织原则,即言语错误可用不同方法来归类。Carroll 总结了 8 种失言:(1)转移(shift),一个音段从它的合适的地方消失而在别的地方出现;(2)倒置(exchange),实际上是双重的转移,两个语言单位互换位置;(3)提前(anticipation),把后面的音段提到了前面;(4)延缓(perseveration),与提前相反,把前面的音段延缓到后面;(5)增加(addition),增添了一些语言材料;(6)减少(deletion),略去了一些语言材料;(7)代替(substitution),一个部分被另一个部分所取代;(8)混合(blend),把两个项目混合成一个,有些混合是一次性的产物,也有些混合词经过多人使用后已为公众所接受,如 brunch、motel 等^{[16]273,274,469,640}。

口述历史工作者面对口误现象时,自然要向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求教。但如上所述,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说法不一致,怎么办?弗洛伊德之说虽然不无道理,但若要说所有的口误都是由潜意识所决定,只怕有些武断。此时要兼听语言学家的意见,不过又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口误的研究者大多是西方语言学家,口误举例及原因分析自然以西方语言为据。西方语言口误形式与汉语口误形式是否一致?在中国语言学家对汉语口误进行精确研究之前,口述历史工作者只能直接面对言语活动现场的实际问题——最好是能够得到语言学家的指导。口述历史中的言语错误即信息错误有三种情况:(1)单纯的口误;(2)一部分记忆错误;(3)一部分知识错误。单纯的口误与记忆错误、知识错误并不是一回事。记忆错误和知识错误各有缘由,也各有表现形态,在许多情况下,是能够明确区分的。但在实际语境中,有一部分记忆错误和一部分知识错误则无法简单辨析,例如口述人将“1945 年”误说成“1949 年”,是口述人的记忆错误,还是口述人的单纯口误?再如:“比如说,湖北东边跟浙江交界地区的方言就是浙江方言。”^[17]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湖北东边只跟安徽、江西交界,即湖北不跟浙江交界。说这话的是一位语言学家,根据常识推理,我们不能说这位语言学家不知道湖北与浙江不搭界这个简单知识,只有假设话语中的“浙江”为“江西”的口误才说得通。

更重要的问题是,口误的原因何在?权且提出一个假设:口误是由心理潜意识作怪、神经元联结失误、语境中的特殊诱因三者单独或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一假设的理论依据是,人类语言是心理、生理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言语失误自然应从这三方面去找寻原因。说口误的部分原因是由潜意识作怪,弗洛伊德已经提出了假设,并提供了一些证据。弗洛伊德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说口误是受到语境中某些特殊诱因的影响,这也有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依据,同时可以在言语活动中找出例证。说它是神经元联结失误,这正是神经语言学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一假设,盼望心理语言学家能够给出更完美而又实用的理论假说。毫无疑问,口述历史需要这方面的假说,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准确识别口误、记忆错误和知识错误,尽量减少口误,及时订正信息错误,以保证口述历史信息 and 知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退一步说,即使无力阻止口误现象的发生,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口误及时纠正过来,也该能纠正多少就尽量纠正多少。

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现场也是语言学家的大好用武之地。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能够验证有关口误的理论假说,语言学家也能通过实际观察和数据统计等方法发现实际言语活动中口误现象的类别及因由。在口述历史采访中,口误现象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辨析及纠正程序也有不少。(1)大部分被说话人自己纠正了,有时话刚刚出口,说话人就意识到发生了口误,立即予以纠正。(2)另一部分能被有很强的语言意识且注意力集中的采访人所纠正,部分是根据采访人的知识进行纠正,部分是根据实际语境及语篇上下文信息进行纠正。(3)剩下的部分由说话人在审阅口述抄本时进行纠正,如上举将《离骚》错说成《楚辞》、将“德国”错说成“日本”两例。(4)剩下的另一部分是由口述历

史文本编纂人发现并纠正,如上举“光复”错说成“解放”等例子。(5)还有极少数漏网者,如上举将“江西”错说成“浙江”的例子,这就只能让读者去辨析了。漏网者只是极少数,因为绝大部分口误都被口述人、采访人、审查者、编纂者发现并纠正,进而在公开发表的编纂抄本中,口误痕迹也一起清除了。有心研究口误现象的语言学家,最好是亲临口述历史现场,其次是观看口述历史采访录像,再次是听采访录音。方法之一是通过口误纠正程序去逆推口误形成的原因,方法之二是仔细观察并记录哪些人更容易发生口误?口误是否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心理状况有关?有怎样的关系?进而,同一个人在同一语境的不同上下文文中发生口误的频次是否有差异?有怎样的差异?进而通过观察研究和统计分析,能不能建立及如何建立有关口误预防和纠错的机制?最后,能不能通过对口误现象的统计分析去验证某种口误理论假说的正确程度或真伪差异?这些问题只有专业语言学家才能解答。在获得语言学的确切理论知识之前,口述历史人只能依据经验行事。

下面要说言语事故的第二类,采访人和口述人在言语活动中的用词错误,即概念使用或理解方面的错误。此类言语事故,并非口误。且看我的错误实例:

陈墨:您这时候仍然是“逍遥”,对这些都不太热心了,是吗?

口述人:对,不是太积极,不像“文革”刚开始那一阵!

这两段话看似无问题,但口述人审稿时在“逍遥”一词后加了120字的注释:“我不记得在口述时什么时候说过‘文革’当中我曾变得‘逍遥’的话。实际上,在‘文革’的全过程,我从来就没有真正‘逍遥’过,包括在‘干校’时期,我曾被‘冷落’,情绪稍显低沉,但依然不‘逍遥’,不洒脱,该干的事还是照干。这大概也是我人格的一大缺陷。”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用词不当,但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确实是我用词不当。我写下了《采编人杂记:关于“逍遥”和“低沉”》作为附录^①。再如:

口述人:……第一本电影还没有演完,发动机就出问题了。我们没有用过那个发电机,临出发前,修配组的发电技师简单教了一下,谁发电我记不清了,那时发电也是两个人。

陈墨:那是8个人阶段?

口述人:对。结果出问题了,咋都修不好。^{[13]84-85}

这里“那是8个人阶段?”是错误的提问引出错误的回答。这并非口误,而是我对上文“那时发电也是两个人”错误理解和错误推断造成的^②。我的理解和推断错误又让口述人跟着出错。在口述历史中,采访人出错,口述人当然也会出现此类错误。如:“对。那没办法,有啥办法?我说就是这样子。人家卢树坤在这儿待了一年多,调回去了;别的人像李晶莹啥的,都调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18]这段话中说卢树坤“调回去了”,指从长安县调回西安市,这一信息并不准确^③。上面几例看似简单,但这些言语事故若不订正解释,肯定会影响到口述历史言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语言学方面,这类事故恐怕要比口误现象更为复杂。它牵涉到言语的生产,也牵涉到言语的理解;涉及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也涉及言语习惯或言语惯性;涉及说话人言语时的心理状态及情绪因素,也涉及言语时的具体语境和上下文;涉及对话关系,也涉及对话主题中的复杂人际关系。这样的言

① 《采编人杂记:关于“逍遥”和“低沉”》的要点是:“逍遥”和“低沉”确实有重要差异,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机制。逍遥是积极主动的行为,是觉得政治运动和派性斗争不合意,于是主动选择脱离,穷则独善其身,是情绪饱满、内心平和、积极飘逸,用陈老师的话说,那叫洒脱。“情绪稍显低沉”并不是自己不想玩,而是得不到组织的信任,被组织冷落,不得不看别人热闹,是情绪低落、内心纠结、消极懈怠,是不得已。陈老师的注释提醒了我,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若有一个关键性词语使用得不准确,会有怎样的误读、误解和误导。见陈墨采编、陈骏涛口述《陈骏涛口述历史》,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此前我已知道,女子电影队成立前,女队员们曾经在陕西电影三队实习过,实习时三队共有8人,即4个师傅(男性)和4个学员(女性)。我也知道,在女子放映队成立之初,只有5个人,女子放映队从未有过8个人同时的情况。之所以犯错,应该是听到“发电也是两个人”这话后想当然地推断:放映、卖票、宣传等也各有两个人,加起来就有8个人。犯错的根本原因可能是那一刻注意力不集中。

③ 实际情况是:卢树坤并没有直接从长安县调回西安市,而是因为怀孕,受到组织照顾,从长安县农村巡回电影队调到咸阳市电影院——咸阳离西安比长安离西安还要远——在咸阳工作一年之后,才调回西安。口述人并非不知道此事,但因为她在长安县工作时间最长,丈夫在西安,夫妻分居头尾25年(1953—1978年),说到这一段往事不免有些情绪。更重要的是,她和卢树坤之间还有些矛盾(是在“文革”中由政治社会压力造成的),多少有些成见,因此对卢树坤是否直接调回西安一事,就不加分辨地陈述了。

语事故作为一种现象,需要语言学家的专业解释。

再说说言语事故的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说的“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现象,心理语言学称之为“词在唇边现象”(Tip-of-the-tongue phenomena)。生活中的人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些明明记得很熟的信息,在说话时瞬间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或使用心回忆,也只记得起其中某些片断,但却提取不出整个词。有时候当时说不出来,过一会儿就想起来了;有时候则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想起来。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这类言语事故也常常发生。例如:“一个叫……我想不起来。现在就是一个死了,叫吕志平,搞幻灯的,就是他画画。还有一个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会儿想起来再说。”^{[18]219-220}对此,心理语言学家指出:大概有70%的词在唇边的错误都是声音上和目标词相近的,意义上相近的只有30%。这说明,一旦受试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以意义为基础的词,他们在提取不出该词时很容易接受一个在语音上相近的词。所以意义和声音两者在词语提取和产生中都起作用。知道意义可以引导受试正确提取一个词,但如果语音记得不清楚,和目标词的语音相近的词就会被“误认”^{[16]273}。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心理语言学家指出,如此话在嘴边或词在唇边现象产生的机制和缘由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一种“神经瞬间短路”?

三、口述历史抄本:言语与文字

本节讨论将口述历史录音转换为纸质抄本的问题。“纸质抄本(paper transcript)仍然是实现以下工作最有效率和最划算的方法,包括组织与管理访谈,创建诸如摘要、目录条目与索引的检索工具,以及方便研究者使用。”^[3]口述史家曾乐观地认为:“录音机可以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们的叙事技巧——首次得到真正的理解。”^[19]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当我们将口述历史抄本——原始抄本或经整理及改写的编纂抄本——交给受访人审查时,许多受访人会大吃一惊甚至无法接受:这是我说的吗?怎么会这么琐碎、凌乱、啰嗦、跳跃、含糊?!有些受访人干脆拒不承认那是自己的言语,或责怪抄本整理者“没有水平”;有文字能力的受访人干脆动手改写,极端情况是将口述抄本全部重新写过。为什么口语会如此?语言学家指出,口头语是第一性的,而且一些特点如传播的多向性和接受的单向性、即时性、反馈性、羡余性、经济性、题材的随机性等,是口头语独有的^{[16]346}。口语是听的,听和说连在一起,要求快,因而说话是随想随说甚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话时除了连词成句以外,还可利用高低快慢的变化、各种特殊的语调、身势等伴随的动作及说话时的情景。口头交际讲求效率,有这么多的条件可利用,口语用词范围可以比较窄,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还可以有重复、脱节、颠倒、补说,也有起填空作用的“呃,呃”“这个,那个”之类^{[6]185}。口语之所以会出现琐碎凌乱现象,原因如下:(1)说话人现场表述时计划及执行出错。说话人若没有都计划好,执行起来就有很多失误。有时句子成分尚未计划好,说话人就开始说话了,当然容易出错,这时需要停顿或改正,由此又产生凌乱^①。(2)“在语言上(不但是文字上)也有同样的两个相反的势力在那儿对敌:一个就是说话的人或写字的人总喜欢偷懒,能够多方便多快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可是听的人或看字的人,他要求清楚……熟人他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听惯了我的声音了,我就用不着说得很清楚……所以人总是求懒,总是望糊涂里去。”^[20](3)口语的意义表达有时是“由于语调的作用而彰显,而语调是任何已知文字都无法记录的重要现象”^②。(4)现实语境中的交流是通过

① 桂诗春编著《新编心理语言学》,第483、467页。书中还说,话语生成大体上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把意念转换成要传递的信息;其次是把信息形成言语计划;第三是执行言语计划;第四是自我督察。

②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第74页。有一个经常被语言学家谈及的例子,即“小于不会唱戏”这句话,在书面语中看起来只有一个意义:即小于这个人不会唱戏。在实际的口语中,根据重音的不同,就有以下多种意思:(1)小于不会唱戏(小李会唱);(2)小于不会唱戏(谁说他会唱?);(3)小于不会唱戏(不是不肯唱);(4)小于不会唱戏(他只会看戏);(5)小于不会唱戏(他会唱歌)。王德春《现代语言学研究》,第5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个例子的另一个版本是:“我不会唱歌”这句话,根据强调的不同,可以说成“我不会唱歌”(你来唱);“我不会唱歌”(谁说我会唱);“我不会唱歌”(不是不肯唱);“我不会唱歌”(听唱歌倒是喜欢的);“我不会唱歌”(说段相声吧),等等。威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第91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多渠道进行的，“毫无疑问，身体语言经常能够展现更多人的心理状态”，精神分析专家说：“我习惯于不仅仅听病人说话，还观察他们的动作、姿势和手势。”^{[21]43} 语言学家伯德维斯特尔指出，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其有声部分提供的交际信息不足 35%，其余 65% 的信息是无声的非语言信号（包括体态、服饰、环境等）传递的。艾伯特·梅瑞宾的调查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还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交谈双方的相互理解 = 语调（38%）+ 表情（55%）+ 语言（7%）^①。（5）自然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是有歧义的，准确意思只有在一定上下文中才能确定^{[22]192}。在实际语境中，人们对口语中的凌乱琐碎及颠倒跳跃等并不感到困扰，甚至没啥知觉，是因为我们不仅在听对方的语句，且在听语句中的语调，同时还在看对方的表情，感受对方的言语执行计划，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并联系语篇上下文，全方位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在对话交流过程中不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编辑，将对方话语中的缺漏、颠倒、凌乱、啰嗦和模糊等处进行现场修订。

将口述录音转成文字抄本，离开了具体语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话语一旦书写下来，脱离了说出时的自然条件，就像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说的那样，‘无法单独地勉强自卫或自助’，丧失了‘父亲的扶持’，成为‘鲜活的话语’的脆弱‘偶像’。”^{[1]74} 口述人惊讶于自己讲话录音的凌乱破碎，甚至不相信或不承认是自己说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不是只有普通人的口语转换成文字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语言学家们在日常言语对话中也有口语凌乱的尴尬——在一次心理语言学讨论会上，把一些学者在小组讨论时的发言录了音，发现人们自然言语失误颇多，如果照写下来，不大容易理解^{[16]466}。忠实于录音的文字抄本之所以让人难以理解，是由于人们习惯了文字书面语。如语言学家所说，书面语是看的。看和写连在一起，可以从容推敲、仔细琢磨。但是口语中的快慢高低变化、特殊语调、身势和说话场景都不起作用了，只有标点符号还起一点作用，但也有限。书面语只能用别的手段来弥补不足：扩大用词的范围，使用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尽量排除废话，讲究篇章结构、连贯照应等。口语和书面语的这些差别是由表达媒介的不同决定的，它们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风格变异^②。从理论上说，“文字的基本性质是对语言的再编码，是语言的书写/视觉符号系统”^{[6]165}；但问题是，“文字相对于所联系的语言，既有关系密切的适应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6]176}。因此，必须正视文字与口语间的明显差异。

如何将口述历史的录音转换成可以阅读的文字抄本？亦即应按照怎样的规则去整理和编纂口述历史？这是口述史学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从原始抄本到最终抄本的形成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权威体系（systems of authority）对于文本的强加”^[3]，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权威体系？怎样强加？口

①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第 202 页。伯德维斯特尔说：“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再也不愿意把语言体系和非语言体系视为孤立的交际体系了。越来越多的资料都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语言体系和体语体系都不能单独构成交际体系，只有两者相结合并与其他感官渠道的相应系统相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交际体系。”见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第 3-4 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年。毕继万指出：非语言交际手段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类：（1）体态语（Body language）：包括基本姿态、礼节动作及人体各部分动作。（2）副语言（Paralanguage）：包括沉默、话轮交替和各种非语义声音。（3）客体语（Object Language）：包括修饰、气味、衣着、化妆以及个人用品。（4）环境语（Environmental）：包括空间、时间、距离、建筑及室内装修、颜色、标志等。

② 叶蜷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修订版）第 185 页。口头词语（spoken words）和视觉词语（visual words）的差别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1）口头语在时间上分布，而书面语在空间上分布。这个差别对知觉分析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影响：（a）理论上的解释应该考虑信息是怎样跨越时间来组织的。一般来说，口头语的模型使用一种策略来把输入信号和记忆中的模块或静态的表征相匹配。这种以模块为基础的方法忽略了口头语信息在时间上的分布。（b）书面语和口头语存在重要差别。在正常情况下，书面材料在遇到歧义时可以反复阅读和分析；而口头语是一次性的，很快就从听觉场消失。所以理论上必须解释听者在信号具有内在的短暂性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处理言语。（2）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输入方式有不同的特点。书面语是稳定的，例如我们在打字机或计算机上不断敲一个字母，打出来的都是同样的字母。但口头语变化很大，说话人把一个因素说几遍，它的波形图都不一样。不同的说话人说同一个因素，它的音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不一样，说话的速度也不一样。（3）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另一个差别和信息的线性有关。印在纸上的字母有明显界限，而且是线性排列的。连续的声音可表示为一个字符串。口头语却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用来标音的语言符号和言语的波形往往没有次序上对应。在实际的语言里，音素是重叠的和同时发出音来，以取得每秒钟传递 10 个音素的速度。这个特点对那些从左到右按次序提取的模型也提出了挑战。（4）口头语和书面语在切分方面也有差别。字母和词在书面语中是分开的，但在口头语中却不然……在连续性的发音里，词与词之间并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在流利的口头语中，切分几乎是不存在的。语音和音素之间缺乏切分对理论模型的建立者也是一个挑战。见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第 262-263 页。

述历史抄本多数由采访人根据录音整理出原始抄本或编纂抄本,送交口述人审查,经双方协商后定稿,即完成标准抄本。少数情况如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和杨晓主编的《蜀中琴人口述史》等,由采访人自己整理甚或直接“撰写”^①。还有极少数情况如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的《舒芜口述自传》,由采访人整理录音,受访口述人多次增删并定稿^②。问题的关键不是由谁来整理,而是如何整理。我所见到的口述历史出版物,大多以书面语形式按书面语规则将口述历史的口语化内容“撰写”出来,实际上是重新表述口述人的话语。有些撰稿人有意识地想要保持口述者的口语特点,如《师哲回忆录》的撰写者说:“由于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半文半白,形容词、定语使用频率高(俄文的特点),倒装句较多、口语化等,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尽量予以保留,同时力求使本书的语言朴素流畅,采用白描手法,同师哲的身份更加贴切。”^③但多数口述历史撰写稿却无意保持口语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抹去口语痕迹。口述历史的整理人及撰写者通常不大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以为只要在撰写文本中传达出口述人的意思就好。这就出现了问题:(1)假如不是对受访人的口述做忠实呈现,而是由整理人或撰写人按自己的理解进行再表达,如何能肯定整理稿和撰写稿呈现的是受访人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有人会说:整理稿或撰写稿经过受访人亲自审阅,有些口述历史文本实际上还是由受访人亲自定稿,如此即可确保整理稿和撰写稿准确无误。(2)假如书写可以解决问题,让采访人直接采写,或由受访人直接写出回忆录、自传或有关专题证明材料,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做口述历史呢?人们通常认为,口述与书写只是媒介形式不同,很少想到“书面语并非抄写下来的口语,而是一种既是语言学的,也是文化的新现象”;语言学家甚至警告说:“文字使人看不清语言的面貌,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乔装打扮。”^{[1]84-85}

口述历史抄本制作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采访现场感、保持口语形态及口语痕迹,不仅是抄本整理和编纂的操作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需要口述史学研究者思考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口述历史的口语对话形式关乎口述历史的价值与本性。口述历史不仅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的资源价值,还有语言学的资源价值,口述历史整理人和编纂者当明白并牢记: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对语言的再编码系统^{[6]7}。按此共识,口述历史的编纂抄本应努力向现场口语靠拢,须特别警惕书面语对口语的遮蔽、改写和扭曲。如唐纳德·里奇所说:语言学家特别强调创作出忠实地复制人们语言的抄本,他们应用的是从语音到细节都有明确概念的系统,有时甚至要计算说话者停顿的秒数……抄本制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精确地重现所听到的录音带内容。抄本制作者切不可重组文字或为文章的风格删减字句。有些计划允许抄本制作者删除一些“错误话头”。就是受访者开口先说出的话,后来因为心意一转,改变语调,就被打断了……不过有些“错误话头”所显示的是心理过程、弗洛伊德式口误(Freudian slips,指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内心话)以及企图隐藏的信息^{[23]56-59}。会话分析学创始人萨克斯、谢格罗夫和杰弗逊在研究大量日常会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研究方法(包括十分精细的会话录音转写符号)^{[5]169},值得参考和学习。

在口述历史界尤其是中国口述历史界,并非所有人都遵守忠实于口语这一原则,更非所有人都具有自觉的语言学意识。中国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有些本身就是采访人或口述人撰写的;有些即使

① 杨晓说:“撰写口述文本,对我个人来说真是巨大的挑战。如何以第一人称撰写口述文本?用什么样的逻辑撰写?如何取舍材料?如何用贴近琴人个性的语言去书写?它不仅需要对书写对象深刻理解,还需要根据口述文本广泛寻求更丰富的文献与口碑资料。”见杨晓主编《蜀中琴人口述史·跋:七弦后学四人谈》,第4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② 许福芦在《后记》中说:“我们的方法是,先录音……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请舒芜先生过目。毕竟往事如烟,聊一遍甚至聊几遍也还有抵达不到的地方,文字触动一下,就可能达到钩沉的目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第378-3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③ 李海文《整理者序》,见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7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按:《师哲回忆录》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它的基础是师哲本人撰写的若干回忆录,再加上撰写人与师哲的对话记录以及有关档案资料综合撰写而成。有意思的是,李海文认定这是师哲的口述史:“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见李海文《整理者序》,第6页。

有录音依据,但整理/编纂者和口述者/审稿人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加以改写。这样做的理由很多,诸如让口述历史保有话语的明确性、句子的完整性、意义的清晰性、文本的可读性等等。甚至有人认为:“在人类当前的各种语言中,其他语言甚至难以成为一种独立有效的交流手段,而退化为文字语言的一种补充,以至最终只有依赖于文字语言才可能获得意义,甚至只有表现于文字语言中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语言。”^[24]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熟悉并习惯书面语,且被书面语所教化;更深层的原因,在潜意识中多少遗存了对文字的原始敬畏和崇拜——文字仍然带着恐惧和尊敬的光圈,人们还是保持着对书本文献的迷信。口述历史被某些历史学家所轻视,部分原因或在于此;口述历史工作者试图用完整、清晰和可读的书面语改写口述录音,部分原因亦在此吧?

那么究竟如何是好?口述历史先驱者早已有所探索且做出了范例,方法是将口述历史录音整理和文稿编纂分成两道工序,并在规则上稍作区别。即原始抄本须按录音逐字抄录,以备他人查证和语言学家研究。在原始抄本基础上制作的编纂抄本则可稍微变通,即在保持口语形态的前提下兼顾文字书面语的阅读习惯;也即口述历史编纂抄本要在口语真确性和文字可读性之间进行必要的妥协,努力使二者平衡,并保持一定的张力——可称为“语、文张力”——完全按照录音档案呈现,丝毫不加编纂整理,有些含混词语和残损句段怕读者不知所云,那就不切实际。毕竟口述历史的编纂抄本是要让人看,而不是让人听。要公开出版,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编纂抄本就更需保持语、文张力。之所以要这样,首先是因为语言学家指出,标准口语的内容包括中态成分、纯口语成分、俚俗和地域方言成分、纯书面语成分,后两者所占比例是很低的,从理论研究和具体言语实践看,要想从口语中完全剔除这两种成分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播手段的丰富与完善,当代口语与书面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许多领域中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很清晰了^{[9]22-23}。口语和书面语本身并非泾渭分明,只不过有些受访人的口述更接近书面语,如同口述文章;而另一些人的口述则更加口语化,且更加破碎凌乱或含混多歧义,需要编纂人花费功夫填充理顺或注释说明。其次,编纂人一定要领会语言学家的提示:对于实用目的和科学分析两个方面来说,语言是人们说话的方式,而不是某些人认为人们应当怎样说的方式^{[25]143}。“书面语,这就是河面的冰层。被冰层禁锢住但仍在下面流动的水,这就是人们的自然语言。结水成冰,立意把河流止住的寒冷,这就是语法学家和教育家所作的努力。还语言以自由的阳光,这就是战胜常规、打破传统镣铐的不可克制的生命之力。”^{[26]325}最后,口述历史是电子时代的产物,口述历史编纂文本决不可让标准书面语将口述历史的言语之河彻底冻实,从而失去言语之流的真相。麦克卢汉在一次有关现代性的辩论中表达了这种不安和怀旧,他称颂新的电子时代并不是因为其新,而是因为向人类创造力本源的回归,他把这看作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27]。口述历史正是口语文化复兴及向人类创造力本源回归的重要路径,供人阅读的编纂文本也不能抹杀口语的痕迹,遮蔽口语的活力。

四、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研究

本节探讨口述历史对语言学研究能否提供帮助。能或不能,要看它如何落到实处,它如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帮助?这可以分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口述历史能否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特殊路径?二是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人类个体记忆库——能否作为语言学研究资源即语料库?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下面说具体证据。

先说第一个问题,已有语言学家将口述历史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路径,如张宜的《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该书第二章《口述历史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新视角》、第三章《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技术规程》、第四章《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档案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例证^[4]。由语言学家做语言学同行的口述历史,不仅可以获得当代语言学史的鲜活史料,也可以现场讨论和记录语言学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新实验和新证据;还可以将语言学家口述历史过程当作言语现场,记录语言学家会话过程的音变、词汇、句法以及口误等各种真实言语现象。对此言语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各种语言学问题,采访人和受访人可以现场讨论,也

可以记录下来作为专门的语料留作其他同行的研究资源。语言学家对口述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言语问题或语言现象肯定比常人更为敏感,也比外行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进而,口述历史作为语言学研究的路径,不仅可以做语言学家的口述历史,还有另一种选择,可以做非语言学家即特定语言调查对象/新鲜语料提供者的口述历史。语言学家指出,最好的语言素材的来源是被咨询的人,也就是一个说本地话的人^{[25]8}。语言学研究早有行之有效的访谈法,通过个别访谈法或集体访谈法两种方式,诱导受访人说出调查人员所需了解的内容,提供有关语言变化的原始资料^①。为什么还要借用口述历史的访谈方法呢?因为:(1)虽然口述历史访谈与真正的日常会话仍然有所不同,但因为受访人所谈的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记忆,在言语态度和言语方式上更具日常性,因而比纯粹的语言学访谈更接近真实的言语现场。在口述历史访谈中,虽然不能让受访人念词表,但多数人都自然地谈及相近的内容,如家乡、家庭、家人、父母、童年、小学、中学、老师、上课、考试、阅读、思考、交友、青春期、职业、工作态度、人生目标、社会环境……等等,由这些相同的关键词,会很自然地形成相似的语句或语段,以满足语言学研究的需求。(2)口述历史访谈不仅更具日常性,而且话题更广泛,可以观察和研究的语言现象更丰富,语言学访谈的提问法和检测法,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头换面,照样可在口述历史访谈中使用。因此,将语言学访谈方法与口述历史结合起来,可能会发现新的语料、新的言语问题和新的语言现象,提出新问题,或求得新证据。(3)口述历史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更是大有用武之地——口述历史不仅直接呈现鲜活生动的语料,同时还直接呈现这些语料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地域生活环境、家庭教养、文化传承、政治态度、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属性、职业特点、性别特征和年龄特征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线索^②。

进而,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不仅可以在采访现场进行观察研究,还可以设计一些口述历史语言的实验研究。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中,受访人使用的语言不同,有的说方言,有的说普通话,有的说方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或地方官话。对此,我们通常都不怎么在意。采访吴天明导演时,就热闹了,他不仅说,而且唱,有时还带表情和动作,甚至站起身来表演;有时候说陕西(三原/西安)方言,有时候说普通话,有时候还说粗话(方言和普通话)^③。面对这样的情况,语言学家大可设计实验性采访,使用同一个采访提纲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采访:一次用方言采访,让对方说方言,只能说方言;一次用普通话采访,让对方只能说普通话;还可以有一次让对方自由使用方言或普通话,以观察言语实际情况。具体设计目标是:(1)观察语音变化情况,说方言时是否及如何受普通话语音的影响?说普通话时是否及如何受方言的影响?自由转换的言语中的语音变化情况如何?(2)观察词语使用的情况,说方言时与说普通话时在词汇使用方面有怎样的变化?(3)观察语句和语篇的情况,对同一段经历,用方言说和用普通话说,在语句和语篇方面有哪些不同?如果这样的实验

①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第64页。语言学访谈法的主要技巧包括:(1)念词表、句子或语段,这是调查方言语音体系用得最多的技巧。(2)提问,由调查人员提出问题,要求受访人回答,从中获取信息,采集材料。(3)检测,给受试人以某种刺激,使其立即做出语言反应,以观察受试人的语言能力,了解其语言体系的特定规则。

②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或地区、城镇或村落、机构或部门、街区或邻里等使用语言的状况及其历史、地理、人文背景。(2)按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区分的言语共同体,或由说话人的实践活动建构的实践共同体,使用语言变体的状况、缘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3)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标准话和非标准话、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世界性语言和本土化语言等的结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尤其是传递社会意义的功能。(4)人际言语交往中各方面使用语言的状况、变化及其用意和效果。(5)文化、社会、历史、地域等背景和情景、心理、认知等因素对于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选择语码和解释语码的影响,以及语码选择在建构个人身份认同和调适人际关系中的效用。(6)社会及其不同群体或个体对各种语言变体的认同、态度和评价(法定的或实际的、显性的或隐性的、持久的或短暂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学习、使用和传播语言变体的影响和效应。(7)由语言接触和语言态度引起的语言使用上的变化及对语言结构的影响。(8)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人口流动或迁徙而导致的语言使用格局上的变化及对语言生命力的影响。(9)社会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实际语言问题,以及为此而采取的对策如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及其效果。见祝晓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30-31页。

③ 见陈墨《口述历史杂谈·关于吴天明:未完成采访的手记》,第227-238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吴天门口述历史的录音录像档案现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尚未对外开放。

性采访切实可行,就还可以进行一系列实验,观察同一方言区的双言使用者的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方面如何相互影响,有哪些规律?进而,在同一方言区的双言使用者因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及社会身份的不同,会有哪些不同?是否有规律可循?我相信,只要语言学家参与口述历史工作,肯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实验性采访方案,并证明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一条可行路径。

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还可在抄本整理过程的参与和观察中进行语言学研究。这分两种情况:(1)语言学家直接参与采访与采访录音抄本整理工作。就主访者而言,要对受访者的个人经验进行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而如何将受访者的话语转变为文字记录也是一个挑战,这一过程同样会有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可能,最值得推敲的是口语记录和整体情境的差距以及口语与文字的差距^{[28]31}。(2)语言学家若不直接参与采访和抄本整理,也可观察和研究口述历史采访和抄本整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语言学问题。唐纳德·里奇指出:抄本制作更多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曾做过一次实验,让4位有经验的人为同样10分钟的录音制作抄本,结果由于要编辑表明声音和行动的词语变化太多,4个抄本从缺乏创造性的逐字抄录到进一步的词汇润色,面貌截然不同。每一个版本的表述都是合理合法的,但与访谈者和计划主持人要求抄本制作者最终完成的风格差距甚远^{[23]60}。在口述历史实际工作中,多人参与尤其是大规模口述历史项目,如我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由于采访和录音整理的工作量都很大,需要分工合作,采访人、录音整理人、编纂人往往并非同一人,采访人是A,录音原始抄本整理人是B,抄本编纂人是C,三者对同一份录音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这成了口述历史工作中的一大问题,不仅是录音抄本整理的技术规范问题,更是对言语的理解差异问题。

在录音抄本整理和编纂中还有更大的语言学难题:采访人和受访人如何做到相互理解?他们是否都能准确理解对方的表达?录音抄本整理人、抄本编纂者又如何理解以及能否准确理解采访录音?对人际间的言语理解和相互沟通,别什科夫斯基说:“我们就如同是一群盲人,向空中伸出双手互相寻觅。每个人能够完全懂得的——只有他自己的语言。”^{[9]250}无论在日常会话还是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的确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理解的困境,并因此发生误会和错解。洪堡特指出:运用词语时,每个人都跟别人想得不一樣,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差异像一圈波纹那样在整个语言中散播开来。所以,任何理解同时始终又是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离异^{[29]77}。这又涉及另一个语言学难题:在口述历史中人们如何表达自己所思所感所忆?是否每个人都有能力准确表达自己?在口述历史中,记忆要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处于模糊的状态,此模糊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才得以落实。而透过语言叙说经验的过程,已脱离了原始经验的模糊与混沌,也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28]30}。爱因斯坦曾质问:我们难道没有经历过,要想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所想所感是多么的困难,甚至经常无法做到吗?^{[21]41}如果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感到语言表达的困难,甚至承认经常无法做到言语表达的准确性,普通人又如何保证口述的准确性?人们如何理解及能否精确理解他人的言语,人们如何表达及能否精确表达自己,这两个问题是口述历史的难题,也是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难题,涉及言语的理解和言语的产生。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头疼之地,或许就是语言学家的用武之地:参与口述历史录音档案整理和编纂的人越多,出错的几率就越大,语言学家研究的具体语料也就越丰富。通过对口述历史采访现场、录音录像档案、录音原始抄本整理、原始抄本编纂等多个环节的观察和研究,语言学家当能发现言语理解及其失误的大量语料,对这些语料进行不同方式的统计分析,当能对那些言语理解错误或表述缺陷进行分类研究,找出产生失误或缺陷的具体原因。进而还能察觉、研究和分析口述历史工作参与者言语表达和言语理解的精确性,其具体语境以及参与者的语言能力、受教育程度、内心丰富程度、精神活跃程度及语言敏感程度等因素的关联程度。

下文讨论第二个问题: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能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资源?答案也是肯定的。我国已有语言学家对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中的语气词使用频率进行统计,从篇幅字数基本相等的男女话语材料中看到:在疑问句中使用“吗、呢、吧、啊”等语气词的频率,女性大大高于男性

(平均比率为 72% : 33% 句次)^{[5]137}。这证明可利用口述历史语料做语言学研究。在理论方面,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库可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库。也就是说,假如有更大规模的口述历史,假如我国各民族、各行业及各地区乃至城乡各社区都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建立各自的录音录像档案库——人类个体记忆库、国家记忆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档案收藏——那么中国语言学家将会获得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源。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中国的语言学家在民族语言、方言乃至对语言历时演变(语言史)^①等方面,做出规模更大、更细致和更精准的调查研究。

语言学家为什么要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进行研究?要从两个方面说。从语言学方面说,我国语言学研究开始时间晚、专业人员少、“欠账”也多。(1)中国的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方言、次方言、土语(分得更细一点则是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尚未得到真正充分的研究。(2)最近 30 多年来,中国语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变迁时期,包括:随着留学潮、出国热和出国旅行机会的增加,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的接触机会会有极大增长;因为就业、就学、入伍及商业贸易等原因,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接触频度有极大增长;由于农民工进城,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频率有前所未有的增长,在每个城市都有居民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区,农村社区中则有同村人员远赴全国各地打工又将全国各地方言或官话带回本村。如此大量的语言接触,必然带来语言的变迁。对此,语言学家进行即时跟踪调查和分析研究,不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语言学家可以求助于口述历史所记录积累的语料。有太多的理由应该做口述历史,也有更多的人可以做口述历史: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当然也包括语言学家,地方志、行业志、党史办、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报社、杂志社、传播公司、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机构工作人员,大中小学学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口述历史爱好者,乃至每一个家庭的普通人(为各自家庭的长辈留下口述历史录音录像作为永久纪念)都可以做口述历史。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档案库的建立规模和速度,是专业语料库无法比拟的。因此,语言学家可以利用也必须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进行语言学的专业研究。对口述历史语料库的大规模数据挖掘和研究,还很有可能会改变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模式。

五、口述历史与语言人研究

这里讨论能否通过口述历史语言学路径研究人?这涉及口述历史、语言学和人的研究三者的相关性。语言和人的研究的相关性自古是诱人的难题。推进这一课题的是人类学家,他们从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2]186}。而在这三个纲目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入口;进而,语言研究的深度决定了种族和文化研究的深度。语言学界有其先行者,洪堡特曾提出语言结构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影响的学说,明确指出: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对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是必不可缺的;对于世界观的形成,语言也是必不可缺的,因为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29]25}。可惜很长时间以来,洪堡特的思想并未引起关注,甚至算不上语言学家的共识。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0]这不难理解,语言学作为现代科学,必须有规定的对象和可靠的方法,不得不排除一些无法实际观察或实验证明的经验直觉和理论玄思。可就语言和为语言的研究固然能发现诸多语言学重要规则,却未必能找出人类语言的究竟。“如果拿地球来作比喻,现在能够说清楚的,只是语言的‘地表’层的规则。语言学家正在探索语言的‘地幔’层的奥秘,希望最终能够到达‘地心’。”^{[6]82}什么是语言的“地心”?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语言学家明确意识到,语言科学处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十字路口^{[26]1},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

^① 语言学家指出:“虽然语言变化已经完成,但如果我们将所有语言(或方言)都放在一起进行共时层面上比较的话,就能从中找出语言历时演变的规律。”因为“时间上的变化转瞬即逝,我们很难把握,而空间上的扩散却可以留下痕迹,通过比较语言间共时的关系可以发现语言的历时演变规律。而语言的扩散完全是由人员的流动造成的,因而只有密切联系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才能对它的各种变异形式和历时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见祝晓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 129、132 页。

即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有共同的核心因素,正是人。因此可以推论:语言的“地心”即语言学的究竟,也正是人。如语言学家所言,语言研究是人类探求自身奥秘的重要途径^{[6]4}。换个角度也同样说得通:人类自身奥秘,自必包含语言和语言学的根本奥秘。有鉴于此,海热热写了《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首先声明:这本书产生于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向,是想显示语言学在说明“什么是人”的问题上能够做出哪些贡献。人这个贪心无止境的造物总想凭借自身属性做到自我发现。这种属性正是本书的中心课题:与同类对话的顽固意愿,从事交流的天性……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是智人,首先因为他们是说话的人(homo loquens),语言人。——既然言语行为是人类物种的核心,语言研究工作就不应该继续孤芳自赏地闭门造车^{[1]1985年法文版作者前言,p14-16}。

要完成“语言人”的课题,通过语言研究探索人类自身奥秘,并通过对人类奥秘的了解探索语言和语言学的究竟,尚路途遥远,且有太多断崖迷津,需要语言学家拓路修桥。语言人的问题包含了多个层次:一是不同语系及不同语言的语言人问题,涉及比较语言学及“比较语言人”的问题,亦即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结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问题;二是同一语系或同一语言内部使用不同地域方言和不同的社会方言的语言人问题,即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诸多问题,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等语言人问题;三是同一语言内部的个体语言人问题,即语言的个性差异问题——因为语言渗透到了精神和情感最隐秘的深底,每一个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他的特殊个性,所以,语言始终出自具体的个人,每个人运用语言首先是为了自身的目的^{[29]200}。以上三者互有关联,即:两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数量差别——因而也是结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语言内部两个以上的个人之间^{[1]50}。同时,三者属于语言人问题的不同层次,其间自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有学者细致研究群体变异和个体变异后,提出不能假定两者的变异趋势总是相同的,可能存在“个人模式的变异”,它不与外部社会因素共变,因为说话人既是某些群体的一员,又有属于个人的生活史^{[5]66}。

通过人的言语研究语言人,最佳路径是通过日常言语的个人模式变异,探索说话者性格特征及语言人的一般规律。这一路径基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个人的语言又是这个人的第二形象。此外,语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修养、职业等。语言比外表等第一形象更内在,更真实。”^[22]具体有不同研究路径可循:(1)可以从个人方言角度研究。语言学家指出:谁都知道语言是可变的。即使是同一代、同一地、说一模一样的方言,在同一社会圈子里活动的两个人,他们的说话习惯也永远不会是雷同的。仔细考察一下每一个人的言语,就会发现无数细节上的差别,存在于词的选择,句子的构造,词的某些形式或某些组合的相对使用频率,某些元音、辅音或二者合并时的发音等方面,也存在于快慢、轻重、高低等给口语以生命的方面。可以说,他们说的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种语言,而是这种语言的各种稍有分别的方言^{[2]132}。(2)语言学家指出:语言创新始于个人的说法虽不一定对,但人人都把自己的创新引入语言却是事实。所以,认为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26]280}。因此可以从语言风格学角度研究语言人:尤其是民族风格对比、时代风格对比和个人语言风格对比进行研究和风格统计,进行各种功能风格对语言表达手段的选择研究^①。(3)还可以通过个人的口头禅研究语言人。这既可作为语言风格学的一个子目,亦可作为语言人研究的一条专门路径。个人口头禅与“嗯、啊、呃”等普遍性语气词或“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等大众习惯语不一样,它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词语,通常专属于某个人——或许存在多人拥有相同口头禅情况,亦可研究语言人的共同点及其规律——例如李宗仁先生喜欢用“几希”二字,这是他的口头禅,口述史家不大理解这一点,竟把它当作废话,说“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②。如果有语言学知识就不会那么干。作为个人言语习惯,口头禅是个人的性

① 语言风格学又称语言修辞学,主要内容有:语言风格的性质、原理、方法以及研究的内容,语言风格的要求,语言风格的形成及演变的规律,语言风格的分类,风格对比(包括民族风格对比、时代风格对比、个人风格对比等),风格统计,各种功能风格对语言表达手段的选择,各种功能风格在不同语体、不同文体、不同语境中的表现,作家作品风格等。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第29页。

② 见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附录三”,第8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格、心理及潜意识的隐秘信息和独特标记。有人喜欢说“当然”，几乎每句话都以“当然”二字开头，其中或含有“当然逻辑”和“当然心态”。有人口头禅是“反正”，这与其表面随和内心固执的个性有关。有人口头禅是“说老实话”或“说真的”或“不骗你”，更需认真分析，或许是说话者非常重视真假，或许是意识对潜意识的提示，或许相反。究竟为何，需要与说话人的身份、个性及说话心态结合起来分析解读。一个口述历史受访人喜欢说“你听好了”，我知道他是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当然懂得这是他的话语习惯，也是他对自己身份的强调。只要我们留心，多半能理解若干口头禅的“言外之意”，甚至能追溯其来龙去脉^①。如上所述，有些口头禅相对易解，有些信息的意义还不得而知，并不是所有口头禅都能简单解析，李宗仁喜欢说“几希”，其中有什么道理，我就不懂。好在语言学家有研究口头禅的更多方法，如直接观察法、质性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总之，口头禅是语言人的独特标记，值得专题研究。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语言进行语言人研究，与口述历史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结合口述历史语言做语言人研究？

首先，因为口述历史不仅是言语和语言研究的现场，也是语言人研究的现场。在口述历史的访谈现场，能够全面观察和研究语言和语言人的实际关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人方言和语言风格，同一方言乃至同一语句在不同的人及不同语境中又有不同的缘由、产生方式和具体意义。一个简单口头禅，如“你听好了”，说话者可能是循循善诱的老师、关怀备至的领导，也可能是颐指气使的丈夫或妻子、自以为是的父亲或母亲，还可能是模仿官腔的普通人。在口述历史现场，可以同时了解一个人的言语方式和这个人的文化修养，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在口述历史采访现场，语言学家不仅可以直接观察到日常口语的种种特性，还可以直接观察不同口述人的不同习惯，并结合其社会身份等个人特征深入调查和研究口语的深层奥妙：为什么有人能够出口成章，少有赘语、断裂、重复、啰嗦和歧义；而另一个人则不断跳跃、凌乱不堪、模糊不清？只有充分了解说话人，才有可能探索出其中的奥秘。实际上，在口述历史过程中，说得过于流利的人，固然可能是头脑灵活、训练有素而又准备充分的人，但也有可能是善于辞令、出口成章但却言不由衷的人；相反，说话时不断要“想词”或“找词”的人，固然可能是缺少语文训练或天性木讷羞于言表的人，但也可能是具有语言自觉且非常聪慧，每句话都试图找出最准确的词语来表达的人。只有直接面对其人，才能了解和理解其中的差异，观察语言和语言人的复杂而隐秘的关联。

其次，口述历史经常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质询：某个受访人所说是不是真话？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或口述历史工作者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这实际上是语言学问题，准确地说是语言人要研究的问题。语言学家警告说：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语言都是表达的工具。因此，语言完全可能是骗人的。它只要求我们遵从一些结构规则，而这些规则没有理由精确反映世界的发现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1]144}。心理学家也发出类似警告：我们已了解潜意识因素的作用，对言辞必须持怀疑态度，不能只按表面价值定夺^{[15]49}。言语真或不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一种可能是记忆错误或知识错误，即不自觉地提供不真实信息；一种可能是单纯的口误，即有口无心或口不应心，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言语事故；一种可能是压根儿就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的差异（如幼儿及心智水平不高的成人）；一种可能是心口不一或心口分离，即缺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基本训练，或自我认识模糊，或模仿他人言语，或受到潜意识的暂时控制；还有一种可能是故意说谎。只不过即使故意说谎，动机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出于虚荣或自我保护的突发性说谎，一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习惯性说谎，一种是超强外力压迫下不得不说谎。在口述历史采访过程及档案中，上述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人为什么会说假话？人的言语为什么会真假掺杂？这固然是口述历史的巨大难题，也是语言学及语言人研究的大好机缘：言语不真既关乎语言的产生，更关乎语言和心理和社会本性。口述历史采访过程及档案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实验现场。在口述历史现场

^① 我的同事张锦在一次年终总结时，开头第一句就说“然后”，这不符合语法习惯。对此我很好奇，问他是怎么回事，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做口述历史采访的后遗症，在采访时以倾听为主，经常要以“然后呢？”或“然后……”作为对话合作连接词，说多了，不知不觉地带入日常言语中，成了口头禅。

研究语言人话语不真问题至少有下列特殊优势:(1)因为口述历史采访之前需要做功课,提前了解口述内容相关的重要情节及若干基本事实,有利于识别不真实信息。(2)口述历史采访前要了解受访人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社会身份、职业特点、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还要评估受访人的心理状况、个性特征、社交倾向、行为模式、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等,对口述人的语言风格会有所了解,对某些不真实信息会更为敏感。(3)在倾听口述人言语表述的过程中,除了言语信息,敏感的研究者还可以从对方的神态、动作、眼神、表情甚至微表情中观察其言语的真诚度及其真实程度,假如口述人故意说谎,有经验的采访人或多或少能有所察觉。倘若口述历史采访人是语言学家,那就更能从大量采访实践中,对不真信息进行识别、分类和专门研究,还可以对某些专题进行有计划的现场质性访谈,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索不真信息与语言人的关联规律。

再次,结合口述历史进行语言及语言人研究,更重要的原因如语言学家所说:要彻底了解语言,“就必须研究它和人类全部活动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31]280}。口述历史正是通过个人生平的回忆和讲述,记录和探索个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及生活轨迹。从中可以通过个人与家庭及家人的关系、受教育的过程、从事职业工作的经历的讲述,通过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个人与历史的质性研究访谈,探寻个人的语言习得、语言学习、言语理解、言语创造的基本模式及传播途径,以及个人方言、个人语言风格乃至口头禅等语言奥妙,进而了解个人心理和个人精神的后天建构过程及建构规律,最终了解语言人。从中可以探索语言的究竟,探索语言和语言人的相关性、描述方法及定理公式。

最后,结合口述历史进行语言人的研究,还有两条重要路径。一是口述历史的语言人研究,可以从历史人、社会人、心理人、传播人、教育人等研究中获得启迪,并提供语言学研究的新维度,综合起来就能大大提高语言人研究的认知复杂度。这是因为口述历史资源价值及其本性,本来就需要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多种途径论证和分析。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语言数据库——巨量的口述历史录音和录像档案库,即人类个体记忆库——进行语言人研究方向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包括单语者、双语者和多语者等个体语言人研究、方言学语言人研究、汉语语言人研究以及比较语言人的研究。进行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需要切合实际的理论假说、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模式和更高的专业技能。这些究竟是否具有可能性及可操作性,还要指望具有学术好奇心和专业学养的语言学家、语言思想家、语言人专业科学家去证实或证伪。

六、口述历史与语言危机

最后讨论口述历史与语言的危机及语言的消亡等问题。先要了解有关语言危机、濒危语言及语言消亡的基本情况:(1)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已有上千种语言消亡。据统计,到21世纪末还将有50%甚至90%的语言不再使用^[31]。(2)据估计,世界上现有6000多种语言,21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陆续失去交际功能(有人估计将消亡70%~80%)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5]75}。(3)中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20多种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濒临消亡^①。

一些语言已经消亡,一些语言濒临消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还会有另一些语言濒危乃至消亡。这与口述历史有什么关系?口述历史能有什么作用?答案是:尽管口述历史工作者无法挽救濒危语言,但至少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用口述历史的形式将那些濒危语言尽可能记录下来。对那些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群体,尤其要进行抢救性采访记录。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

① 孙宏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1-7页。关于中国语言的数量,有几种不同说法。一种权威性的说法是:在中国当代语言文字中,56个民族使用65种经过政府和学术界正式确认的语言(另有45种语言,学术界已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但它们的语言地位与身份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34种经过政府和学术界正式确认的文字(另有一些非通用文字、拼音方案、注音符号、少数民族方块字、停止试行的新文字等),见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员手册》,第332-336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另一种权威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进行“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到1995年先后共发现120多种语言,成果集中在《中国的语言》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郭龙生《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第9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人类学家都在设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采访记录,口述历史或许是最值得尝试和推荐的方式。因为口述历史是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自己的家庭及亲友、出生与成长、学习与劳动、结婚生育、分家自立、生老病死等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包含了所在族群的集体生活、先民神话或祖先传说、民族风俗及文化细节;更不必说,每个人的口述言语本身就是最自然、最真实、最丰富且最鲜活的语言资料。假如被记录的语言最终还是消亡了,至少我们记录并保存了这门语言的录音录像档案,可供后人研究这门语言的实际情况,进而研究这个语言群体的文化和心智特点。此种口述历史语料档案有“语言种子库”的价值——以备某一天因某种原因,人类想要设法“复活”这门语言,让它再生。进而,这些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又还有这门语言消亡前的“语言病历”价值,让后人去研究这门语言如何走向消亡,研究这个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是在怎样的环境压力下做出改变,做出怎样的改变,以及“语言生命轨迹”——假如被抢救性记录的这门语言最终竟没有消亡,而是在大规模语言接触和激烈的语言竞争中起死回生了,那就更好——人们可从口述历史所记录的“语言病历”中,寻找语言诊断的经验,乃至某种“语言药方”。

2014年10月,我和几位作家朋友到云南省的一个县,和当地文化工作者讨论“口述历史与乡村社区文化建设”问题,这其实是口述史家的共识:社区应通过口述历史研究揭示自身的历史,形成社会认同,而不是受惠于传统历史知识的假设^[32]。此行遇到好几个少数民族干部(分属于不同民族),他们的汉语非常流利,但却不会说本民族语言。纵然我的语言文化知识非常有限,也能感到这是民族语言危机的一种征兆^①。我对当地朋友提出建议:应抓紧时间为本民族语的长辈做口述历史,而且一定要以各自民族的语言及民族语的本地方言做。帕默尔说:“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33]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媒介,不仅是一种声音系统,同时也是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34]。

说到语言的危机,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汉语的前途如何?多年以前,国内出版过一部书,名为《汉语的危机》^②。从书名可知,编者和作者忧患于汉语的前途。其中颇有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字却越来越少。”1987年公布的《常用字表》所列常用字仅为2500个,这些常用字对现代出版物的覆盖率高达97.97%!次常用字1000个,覆盖率为1.51%。常用字与次常用字两项合计3500个汉字,覆盖率为99.48%^[35]。书中多数文章所涉问题主要是汉语文字和文学中存在的各种乱象,这些乱象是否真正构成了“汉语的危机”?这要语言学家去讨论评判。汉语使用人口多达十多亿,眼下汉语在世界上还颇热门,国内的日常言谈和网络话语中的新词、新概念层出不穷,显得生机勃勃,说汉语的危机恐怕让人难以相信。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语言危机的现行鉴定标准去衡量^③,汉语也远未到濒危程度。

既然汉语远未濒危,谈论“汉语的前途”似乎杞人忧天,只不过汉语眼下虽是无虞,但仍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征象值得注意:(1)语言生态系统已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还有些语言有濒危的征兆。汉语方言中目前不仅弱势方言迅速萎缩,强势方言也呈萎缩趋势,

① 社会语言学家指出:语言替换一般需要经历三代人的时间。第一代人是操本族语的单语者;第二代是双语者,除掌握第一语言外,还会使用第二语言;第三代转用第二语言,即本民族语言在这代人身上开始丧失。语言替换可能会同步发生,即在某一时期当第一代仍然是使用第一语言的单语者时,第三代人已经是使用第二语言的单语者。在语言替换过程中,第一语言会受到第二语言的影响,其形式和用法得以简化,出现借用和语码混合现象。当出现某一集团的人不会讲本民族语言这一极端现象时,语言消亡便由此发生。见祝晓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244页。

② 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分为“汉语与语境”“汉语与危机”“汉语与失语”“汉语与暴力”“汉语与忧思”“汉语与未来”6辑,收入33篇文章,共33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专家会议的文献,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语言专家特别小组提出的鉴别濒危语言濒危程度的标准:(1)代与代之间的语言传递情况;(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目;(3)该语言的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4)该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向;(5)该语言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情况;(6)语言和识字教育的资料状况;(7)政府及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其中包括语言的正式地位和使用情况;(8)社区成员对本集团语言的态度;(9)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见刘汝山、郭璐宁《国外濒危语言研究扫描》。

地域方言正逐步向普通话靠拢^{[5]75}。这虽不能直接推断为汉语的危机,但根据鲁伊斯提出的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以及卡普兰和鲍尔道夫有关语言规划应针对“整个语言生态系统”的观念^①,不能说汉语的前途和命运毫无问题。推广普通话和普及普通话虽是语言规划的应有之义,倘若语言规划只强调语言统一,而不同时设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就会出现语言生态的问题。(2)汉语虽然在国内是强势语言,但在当今世界却有比汉语更加强势的语言如英语。在国内,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把掌握汉语文的人看作“文化人”,称汉语为“大众话”(西北地区)、“公话”(西南地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人都愿意把子女送到用汉语文授课的学校,为子女创造学习汉语文的条件^{[22]190}。当今国际上英语的地位正是如此。过去30年,英语一直是中国中考、高考的必考科目,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将掌握英语当作必需,如此发展下去,多年以后汉语前途会如何?(3)如洪堡特所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当语言的发展仿佛超过了精神的成长,精神陷于松弛怠惰的状态,不再从事独立的创造,它虽拥有产生自实际运用的语词和形式,却只利用它们进行越来越空洞的游戏^②。村上春树针对日语中的此种现象指出:“那已经是在所有场合以所有方式用尽掏空了的语言。换言之,那已是沦为体制性质的沾满污垢的语言。使用这种体制框架内的语言来摇撼进而摧毁体制框架内的状况和僵化的情绪纵然并非不可能,恐怕也是伴随相当大困难的作业。”^[36]

对汉语前途或汉语危机的进一步讨论超出本文范围,这需要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关心。本文提出这个虚拟性的问题,只是想讨论对此口述历史能做些什么?答案是:(1)记录和保藏当代汉语的语言资源;(2)借村上春树之说,现在需要的是来自新的方向的语言,以及用那些语言叙说的焕然一新的物语(旨在净化物语的其他物语)^[37];(3)借保尔·汤普逊之说,口述史家能做到的最重要的社会贡献,是让普通人树立对自己言语的信心^[19];(4)通过口述历史建立国民个体记忆库,积累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资源,丰富国家记忆,推动语言学、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促进我们自知,从多种维度认识我们是谁、长处和短处何在、与他人的差异何在、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5)口述历史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可以让普通人建立生活的价值感和自信心,唤醒人的个性尊严感,激发国民精神消费、精神追求、精神活力、创造勇气和创造能力。上述第(4)(5)两点,看似与解决语言危机没有直接关联,但却可能是预防语言危机的根本方略。语言危机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社会语言人的问题。语言态度决定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而语言态度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一种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发生改变时,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5]112}。语言的危机和语言消亡并非仅因为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文化停滞和文化危机造成的生存压力和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族群心灵僵化、精神活力不足而导致创造能力匮乏。假如一个语言群体缺少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创造性,仅满足于体制和生活习惯上模仿前人、技术乃至学术上模仿他人,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活力,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度,那就不难预测,该群体的语言迟早要濒危,必将被更具文化创造性的强势语言所替代。基于政治权力的语言规划,并不能决定一种语言的命运。中国满语文盛极一时,不过两百年即走向衰落^③,这就是最好的例证。汉语文的命运与

① 社会语言学家指出,先前将语言多样性看作问题的观念忽略了少数族群语言的价值,忽略了语言在少数族群认同当中的重要作用。语言资源观正好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语言多样性问题。认为语言不但不是问题反而是资源的观点,反映出人们对语言多样性的积极评价。语言资源思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卡普兰和鲍尔道夫提出了基于语言生态观念的语言规划模型,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圈,是要规划的语言生态系统,大圈内有小圈,分别表示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语言以及官方语言的非标准变体。语言生态系统会受到语言变量和机构、组织因素的影响。语言变量包括语言消亡、语言生存、语言变化、语言再生、语言转用、语言融合、语言接触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318、319、314页。

②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200页。洪堡特将这种情况视为语言的第二次衰落,而把中止语言的外在形式的创造活动看作语言的第一次衰落。

③ 清王朝顺、康、雍、乾四朝,满语文兴盛发达,统治者曾称满语文为“国语”“国书”,曾想使满语文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但到乾隆末期开始衰落,到清末则基本消亡。见郭龙生《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第150页。

满语文的盛衰虽然不可同日而语,语言兴亡的社会原因及其历史规律却不容忽视,在这个人类创新潜能开发不断加速的时代,只有拥有足够精神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社会群体,才能避免生存和文化危机;只有避免了生存和文化危机,才能避免语言的危机。如布封所说:只有在开明的世纪,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31]405}。

参考文献:

- [1] 克洛德·海热·热. 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 张祖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 陆卓元,译;陆志韦,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 罗纳德·格里,柯里·罗比,玛丽·克拉克. 口述历史与档案馆: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经验为例[G]//杨祥银. 口述史研究:第1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1.
- [4] 张宜. 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59.
- [5] 祝畹瑾.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6] 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修订版. 王洪君,李娟,修订.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 戚雨村. 语言学引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52.
- [8]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 [9] 赵蓉晖. 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10] 王德春. 现代语言学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34.
- [11] 陈墨. 实验性集体访谈录[M]//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45.
- [12] 陈墨. 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6-277.
- [13] 陈墨. 卢树坤访谈录[M]//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71. 发表的编纂抄本中保留了口误记录,但在口误处作了注释说明.
- [14] 弗洛伊德.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M]. 彭丽新,李想,王威威,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 [15] 埃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 [16]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7] 张宜. 口述访谈实例·吴宗济先生口述访谈实录[M]//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09.
- [18] 陈墨. 袁秀英访谈录[M]//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226.
- [19] 保尔·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 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1.
- [20] 赵元任. 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22.
- [21] 乔治·弗兰克尔. 探索潜意识[M]. 华微风,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 [22] 于根元. 应用语言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3] 唐纳德·里奇.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 第2版. 王芝芝,姚力,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24] 黄正华. 语言与知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9.
- [25] B·布洛赫,G·L·特雷杰. 语言分析纲要[M]. 赵世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6]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 语言[M]. 岑麒祥,叶蜚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7] E·M·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4-45.
- [28] 黄克武. 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G]//定宜庄,汪润. 口述史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9] 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0]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23.
- [31] 刘汝山,郭璐宁. 国外濒危语言研究扫描[J]. 当代语言学,2004(4):328-333.
- [32] 约翰·托什. 史学导论·口述史[G]//定宜庄,汪润. 口述史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
- [33] L·R·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李荣,王菊泉,周焕常,陈平,译;吕叔湘,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8.
- [34] 张卫中. 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G]//朱竞. 汉语的危机.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25.
- [35] 王文元. 语言的雅与俗[G]//朱竞. 汉语的危机.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50.
- [36] 村上春树.“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 [M]//地下. 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07.

责任编辑 韩云波